

20 世纪名著导读丛书



20世纪

军事学名著

导读

Review Military Science
Masterpieces
in the 20th Century

曾华锋 盖立阁 石海明 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世纪 曾华锋 盖立阁 石海明 编著

军事学名著导读

20 世纪 名著 导读 丛书

REVIEW MILITARY SCIENCE
MASTERPIECES
IN THE 20TH CENTURY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军事学名著导读/曾华锋, 盖立阁, 石海明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532-6

I. ① 2 … II. ① 曾… ② 盖… ③ 石… III. ① 军事理论—著作—简介—世界—20世纪 IV. ① E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3592号

20世纪军事学名著导读

REVIEW MILITARY SCIENCE MASTERPIECES IN THE 20TH CENTURY

编 著: 曾华锋 盖立阁 石海明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x1092mm 16开 17.25 印张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532-6

定 价: 27.00元

· 序言 ·

在人类文明史上，20 世纪是一个军事主导、血雨腥风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族类相残，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给生灵带来了无穷的浩劫，给文明抹上了浓重的阴影；20 世纪同时也是一个群星璀璨、将星闪耀的世纪——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艺术家化育而出、交相辉映，共同主导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世纪历程。

在回顾 20 世纪的百年沧桑，审视和梳理 20 世纪战争对抗和军事学术发展历程之时，我们的目光最终聚焦在那些改变了 20 世纪战争面貌和世界进程的军事学名著上。虽然那些军事枭雄、战略天才多已作古，但凝聚了他们聪明才智的文献成果却依然留存和流传着。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去触摸 20 世纪的惊心动魄，去感受军事史上的波澜壮阔。于是，就有了这本《20 世纪军事学名著导读》。

“吹尽黄沙始到金。”为什么这些军事学名著历经时间和实践的筛选，不仅保留下来了，而且至今还熠熠生辉呢？这曾是我们反复打量、长久思忖的问题。现在请允许我们将自己的思考与各位读者分享：

第一，它们呼应时代解决了现实问题。对时代特点的真切了解、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把握，是一切名著诞生的首要前提；而对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分析和策略指导，则是诸多名著得以形成的不二法门。无论是毛泽东的《论持

久战》、蒋百里的《国防论》、杨杰的《国防新论》，还是希奇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弗里德曼的《核战略的演变》，无一不是对现实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理论剖析的成果。以《论持久战》一书为例。到1938年春，抗日战争已进行了十月有余，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华北地区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把战线推到华中、华南。在此情况下，具有轻敌倾向的“速胜论”和具有妥协倾向的“亡国论”甚嚣尘上。正是为了廓清思想，让全国人民从“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误区中走出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持久战，正确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预言了中日战争的基本趋势和前途，明确了不同战争阶段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为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了最高、也是最正确的政治指导和战略指导，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第二，它们面向未来进行了前瞻研究。拓荒性的前沿著作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经典，大抵是源于此类著作对未来的洞察、对时空的跨越以及对规律的把握胜人一筹，并随着历史的前行而日益展示出人类理性的光芒与威力。作为西方最早阐述有限战争理论的著作之一，《有限战争》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类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如果人类对自己的行为不加以限制，继续奉行总体战争的理论，势必将世界引向灾难。因此，未来战争将具有局部化、有限化的特点，故称之为有限战争。该书出版后，美国评论界认为它对于美国军事政策和战略的影响，堪与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相媲美。费尔当的《空间战争——武器与新技术》、厄尔曼等所著的《震慑论》都属此类。

第三，它们跨越疆界展示了新的范式。一本好书代表着一种研究进路、一种理论示范和一种分析视角，因此能够超越特定时空、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成为后辈晚学学习借鉴的光辉典范。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克里费尔德的《技术与战争》以及杜普伊的《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皆在此列。比如，《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把作战数据量化分析方法引入军事历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定量评估模型（Quantified Judgment Model，即QJM），该模型是一种数学表达式，可以作为军事演习或预测战斗结果的依据，实质上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探

索和分析军事行动的行为模式。该书正是由于既依托军事史料进行定性研究，又借助数学方法开展严密的定量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因此成为该领域开创性的名著。

第四，它们迎难而上实践着理想信念。“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因而也可视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相互对抗的延展。作为军人和公民，这些经典论著的作者们立足于为国服务、为民谋利，直面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军事斗争现实，将自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转化为坚定的行动，或直接领导、参与军事斗争，或积极探索军事理论创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斯大林文集》、伏龙芝的《伏龙芝文集》、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大脑》等等，无一不体现了作者理想的高远、信念的坚定和行动的果敢，并积淀为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实践，为抵制与遏抑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肆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凡此种种，都使得入选著作摆脱了湮没无闻的结局，具有恒久流传的价值，成为后来读者心中的经典，为推进新时期军事变革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因此，我们解读上述名著的一切尝试和努力，都无外乎抛砖引玉，希冀能够帮助读者把握20世纪军事学成果的累积路径，提升读者的思想高度，站在巨人的肩上进行理论再造，实现文明更生。

一本好书不仅要字斟句酌式地细读，还需要积极开展“并行阅读”和“串行思考”，亦即参照相关领域的其他好书进行批量式连读。借助相互映照，我们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某书精髓，也能够方便迅速地对相关领域、学科或时期有一整体把握，甚或激发新思想的涌现。如欲深刻理解富勒《战争指导》一书中提出的“有限政治目的战争往往能使胜利者获得较大的利益”思想，我们不仅需要该书姐妹篇《西洋世界军事史》的帮助，也离不开小戴维·佐克等人《简明战争史》甚至杰弗里·帕克等人《剑桥战争史》的帮助；要想理解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或许需要参阅该作者的《权力和原则》、《大棋局》；倘若理解杜普伊《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一书提出的“定量评估模型”，那么《武器和战争的演变》、《数字·预测和战争》、《军事历史百科全书》等著作也是颇值

一读的。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编著《20世纪军事学名著导读》的初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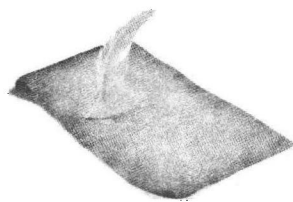
好的著作无一不是将读者视为智者和同道；因而它们所做的，不是一味展示繁琐的推导、罗列枯燥的结论，而是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启发读者自己去判断。就此而言，作为绕不过的文献，每一本名著都是一座散发理性光芒的思想城堡、一个意蕴丰厚的文化据点，静静期待着读者走进来，与作者对话交流。同时我们也深知，与流行读物相比，这些名著读起来并不轻松惬意、悠悠自得；但这也许恰恰是它们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我们坚信，在大多数人青睐“文化快餐”的时候，我们主动远离众声鼎沸的喧嚣、走近历久弥新的思想城堡，不限于粗放了解，致力于自由驾驭，那么我们最终获得的，将不仅仅是知识的扩充，更是思想的洞彻、心灵的充沛、自由的通达。

目录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	1
蒋百里：《国防论》	15
毛泽东：《论持久战》	29
杨杰：《国防新论》	43
古德里安：《坦克——前进！》	57
奥斯古德：《有限战争》	71
希奇等：《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	83
富勒：《战争指导》	97
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	111
施密特：《西方的战略》	123
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135
柯林斯：《大战略》	145
伏龙芝：《伏龙芝选集》	161
斯大林：《斯大林军事文集》	177
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	193
马尔索·费尔当：《空间战争——武器与新技术》	205
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	217
杜普伊：《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	233
克里费尔德：《技术与战争》	247
哈伦·厄尔曼 等：《震慑论》	259

沙波什尼科夫：

《军队大脑》



■ 本书精要

作为苏联著名军事思想家和理论家沙波什尼科夫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详细论述了作为最高统帅部机关的总参谋部的作用、职能和工作实质，阐明了现代战争对各级军事首长、作战指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堪称构建“军队大脑”——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的理论指南。

■ 作者简介

沙波什尼科夫·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1882年出生，1945年去世。苏联元帅，军事理论家。具有较深的军事理论造诣、丰富的军事实践与参谋指挥经验，对苏联军队建设、干部培养及军事理论工作作出较大贡献。获列宁勋章3枚。

1901年入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为第二连士官生，1903年毕业，升任陆军少尉。19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总参谋部学院，1910年毕业。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勇善战，6次获得勋章，并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司令部指挥工作的技巧。1917年10月晋升为上校团长。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先后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助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野战司令部侦察局局长、野战司令部作战部负责人、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参谋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作战部长，参与制订并组织实施红军反击邓尼金军队及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诸多重大战略计划。参与制订了1919年10月的反攻作战计划，并为1920年西南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克里木地区战局计划的制订者之一。

内战结束后任工农红军第一副参谋长。1925—1940年历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莫斯科军区司令（1925—1928）、工农红军参谋长（1928—1931）、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1931—1932）、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32—1935）、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5—1937）、苏军总参谋长（1937—1940）、苏联国防委员人民委员会副国防人民委员（1940—1941）等职。在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期间，沙波什尼科夫进一步明确了学院的培训目标，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军事技能，而且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还围绕学院的组织结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体制等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1934年获得红星勋章；1935年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获得工农红军高等军事院校教授职称；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被授予列宁勋章；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后为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0年成为苏联元帅。

苏德战争中历任西战略方向参谋长、总参谋长（1941—1942）、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3）、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43—1945），并曾兼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直接参与计划、组织和实施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会战等重大战役计划。他一直任最高指挥部大本营顾问。1945年2月获得了第三枚列宁勋章和“莫斯科防御战”纪念章。1945年3月26日溘然长逝，被葬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墙旁边。

沙波什尼科夫谙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和指挥部队的实践经验，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总结国内战争的作战经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参加了条令制定委员会的工作，制定了苏联军事理论的基本原则，对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巩固和完善武装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著作包括莫斯科1924年版的《在维斯瓦河》、莫斯科1927—1929年版《军队大脑》（1—3册），莫斯科1974年版

《回忆录和军事科学论文》。

作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为苏联军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将领和军事干部，像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瓦杜丁大将、安东诺夫大将、什捷缅科大将等人都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一手培养出来的。斯大林曾开玩笑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是“沙波什尼科夫的人”。

■ 作品内容

《军队大脑》原书是苏联元帅、著名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沙波什尼科夫于1927—1929年间先后发表的论述军队统帅指挥机关的三卷集军事理论巨著，共有900页、80余万字。1965年，在作者逝世20周年，苏联出版了该书的删节本，中译本就是根据这一删节本翻译的，于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该书的撰写背景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在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这些国家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主动加强理论研究，积极推进本国军队建设，特别是总参谋部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尤其重视改革德国式的总参谋部问题。而苏联红军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并且必须完成彻底消除旧沙皇军队残余、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军事统帅机关的双重任务。正是针对这一现实任务，作者在这一军事理论巨著中“阐述了关于未来战争性质的基本观点，深刻揭示了指导现代战争的特征，提供了作为最高统帅部指挥武装力量机关的总参谋部的作用、职能和机构的广泛知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该书除前言外共有八章内容，分别是：“关于总参谋长的几点想法”、“一切质量取决于它”、“对内政策与总参谋部”、“经济与战争”、“对外政策与战争”、“战争计划与对外政策”、“动员是战争的序幕”和“联盟战争”。全书围绕科学预测未来战争、正确评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苏军总参谋部平时和战时的工作职能及其在国家指挥体系和军事体系中应占有的地位、怎样开展工作才能取得“大脑”应有的成果等问题，详细论述了作为最高统帅部机关的总参谋部的作用、职能及其工作实质，阐明了现代战争对各级军事首长、各级作战指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的各项要求，同时从理论

上论证并提出了武装力量应具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的必要性。

纵观全书，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在反思德国式的统帅体制彻底破产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现代战争的准备和实施离不开“国家首脑集体”和“集体指挥机构”的双重领导和密切配合；而“集体智慧机构”集中体现为一个强有力的总参谋部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把总参谋长看做是一位‘统帅’，但不是老观念中的那种统帅，而是一位‘国务活动家’，是指导战争的‘集体’成员之一。”^①

在作者看来，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很大不足，其原因就在于克氏对统帅的定位和作用已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克劳塞维茨一方面认为统帅应当成为‘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仍然首先不失为一个‘统帅’，即军事家。他的工作应注重认识战争的军事本质，同时不忽视战争的其他方面。克劳塞维茨的后代——来自施普累河地区的德国人及其后的康拉德在阐述上述原则时把它发展为实施战争过程中要实行军事上的独裁，这种思想遭到明显失败，这是我们记忆犹新的。这几位‘总参谋部的大人物’因对战争的高级领域缺乏真正的认识，结果为此而丢掉了脑袋。”^②

上述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无法找到作为某个个人的那种完整意义的统帅，他的实质已变为一个‘集体’。在现代战争中，即使是曾经驰名于历史的三人执政制度也会感到无能为力的。……‘军事官吏’永远退出了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由‘集体’进行工作，以实施对现代战争的指挥。所以，在我们的时代，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去给昔日的‘统帅个人’唱颂歌和讲述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的。……在我们的时代，对整个战争的指导已从统帅之手完全转到集体之手，这已成为无可逆转的事实。在这个集体中，统帅是负责战争军事方面工作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在战争的其他领域中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决不是领导整个国家。”^③

因此，正确推进总参谋部建设就成为战争准备工作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

①②③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4—17页。

节：“要想有条不紊地进行规模宏大的战争准备工作，就必须有这样的集体，只有总参谋部才能使战争准备工作互相配合，步调一致，而总参谋部是一群，是一群在同等条件下，在同一领导下形成并检验过自己的军事观点的人，是经过仔细挑选提拔上来，能相互负责并为取得军事建设中的转折而和谐行动的人。”^① 这就意味着当今的统帅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时代的统帅只能满足于军事指挥机构整个工作总方向的指导思想，从指挥机构的良好工作中寻求乐趣。换言之，当今的统帅越来越确信出色地开展集体工作的必要性。指挥机关和思想工作领导部门所属机构的作用日益提高……我们时代的统帅不能依靠拿破仑当时的参谋部，甚至不能依靠贝蒂耶的参谋部来进行工作。”^② 简言之，“现代统帅只需要一个工作能力强的指挥机构，而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③ 这是因为，从毛奇时代开始，参谋部工作人员也要参加研究战争准备和实施工作的思想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一要求一年比一年高。没有个工作协调、思想活跃的军事指挥机构，就无法开展战争准备工作和进行战争。

二、要将总参谋部建设成为一个合格而健全的指挥机构，就必须确保总参谋部成员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过硬、意志和性格坚强；同时他们要对一切问题经常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必须随时熟悉国内政策并在制定一切预案时将其估价进去

在沙波什尼科夫看来，总参谋部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全面而综合的军事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这就包括：“①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各种军事活动现象具有统一的认识；②工作人员本身要不断学习飞速发展中的军事知识；③在性格方面加以训练；④提高参谋部勤务技术工作的水平；⑤增强工作人员的体格，因为参谋部工作要求具有良好的体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④

但是单单具备上述素质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针对某些参谋部负责工作人员躲避政治的倾向，作者明确指出，“参谋部负责工作人员不应当躲避政治，而应当：①具有相适应的政治修养，随时熟悉本国和邻国的政治状况；②不搞自己一套纯军事的政治，因为事实上这种独立的政治是不存在

①②③④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22、30页。

的……所有同代人（德国人、法国人等等）现在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总参谋部政治上无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前面给总参谋长的职责中加了一条新要求：关心所属工作人员的政治训练和政治教育。……总参谋部应当注意政治生活状况，应当从中得出某些结论，从国防需要出发提出某些希望，但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凌驾于国家生活其他发展部门之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军事学术不能给政治发号施令。’”^①

参谋部负责的工作人员必须关心政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看到：①现代军队不能脱离国内政策而存在；②军队是国家的缩影；③要保持军队的政治情绪，应专门对其进行与国家实行的国内政策相适应的工作；④不是军队教育社会，而是相反，应是社会培养军队……几乎所有国家在和平时期或在爆发战争时都要建立国防委员会，负责对整个战争的指挥，从而也相应地指导国家的对内政策。”^②

上述情况意味着，“现代军事要求对一切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随时熟悉国内政策并在制定一切预案时将其估价进去”：“我们根本不同意把总参谋部同国家的内部关系截然分开，相反，我们认为，总参谋部作为一个军事指挥机关，随时熟悉国内政策并在制定一切预案时将其估价进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总参谋部应当在指挥战争及战争的准备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又要记住，战争是一般历史现象，不是单靠一些交战能解决的。按照列宁的论述，我们时代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领导战争的只能是国家政权，而不是军事机关。”^③

三、总参谋部必须高度重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并能够对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加以考虑并予以支持

关于战争与经济，作者明确指出了战争与经济的相互激发作用和机制：“经济力量的发展告诉我们：第一，未来的战争必不可免地要引起经济斗争，后方参与这场斗争的程度即使不比前线更大，也不会更小；第二，经济斗争必将使正在进行的阶级分化过程激化起来，因而自然有可能使战争转变为革

①②③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0、51—52页。

命；第三，生产力的发展将使交战各国获得比现在更能致人死命的武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给交战双方提供比平时改型换代更具有杀伤破坏力的兵器。”^① 因此为了判定未来战争的性质，要求正确判断敌我两国的经济实力：“唯有正确评估本国和敌对各国的经济实力，弄清其发展经济的各种因素，才能正确预测未来战争的性质”，“研究经济力量并考虑到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是判定未来战争性质的最可靠的途径，我们建议‘战略家’——‘国务活动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换句话说，一方面他们必须掌握有关本国生产力现状和发展情况的详尽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对敌方的此类情况进行广泛的侦察。如今，经济侦察已经如同搜集敌国实力和兵力其他要素的情报一样，极其需要和必不可少。”^②

此外，经济对战争的支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制约因素：“军事预算和战争费用的关系极为密切。军事预算越大，战争的费用就越小。雄厚的军事预算可以保证积聚动员储备品，因而 A·斯韦钦甚至建议以军事预算中‘用于采办动员储备品和用于基本设施的百分率’来‘说明’军事预算的性质。事实确实如此，根据一个国家预算中预计和实际用于积聚动员储备品和准备战区所占的百分率，可以判断出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正在进行武装力量的战争准备，以及其紧张程度如何。只用于平时维持军队的预算，这是对国家钱财和国民财富的徒劳无益的浪费。”^③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现代战争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参谋部人员必须重视经济作战计划的制定问题，特别是不仅应规定如何使军队和战区做好战争准备，不仅应包括“军事方面”，如保证军队一切供应等，而且应涉及战争期间国家的整个“经济行动方针”。经济作战计划应规定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财政动员、经济动员和交通运输进行周密筹划和切实准备。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受到现代总参谋部的关注，总参谋部应对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加以充分考虑并予以支持；战争的经济计划总方针给总参谋部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结论性概念，而这反过来又为政府确定战争性质和“选用武装力量总的行动方式”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整个来说，准备战争、进行战争和对战

①②③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7、59—60、75 页。

争胜败承担责任的不是总参谋部，而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政府由它本身或通过专门的机构（国防委员会）按照各项‘方针’协调好准备工作。……至于总参谋部，它应当通过自己派驻在负责各个战线战争准备工作的‘战斗机关’的代表，了解这些机关的工作情况，负责从最有效地满足作战要求出发提出相应建议，但是不可在这些机关独断专行。必须记住：最后批准战争计划是政府的事，如果国家经济力量过于紧张，无论在战场上取得多么辉煌的胜利，都潜伏着战败的危险。”^①

虽然使军事计划获得坚实而周详的经济基础不是总参谋部的事，但有关军事计划的所有主要建议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由作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提出。但是这里依旧要牢记的是，“‘军事学术不能给政治发号施令’，而军事预算不仅是纯粹的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首先又是经济问题。”^②

实际上讨论战争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一个合理的外延就是综合国力的问题。作者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实：“未来的战争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要求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由此可见，战争只能由国家统筹掌握指挥并动员整个国家机器一致行动。”“现代战争只能由整个国家进行，绝非单一武装力量所能胜任。”“早在世界大战临近时期，动员便已是一种其影响深入扩大到整个国家生活，而非只限于军事范围的现象。现在由于技术的日益复杂以及斗争双方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巨大紧张程度，作为整个国家现象的动员的意义更加大了。我们今天的动员涉及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以不同方式影响到几乎每个公民的生活。”^③这的确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四、“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计划要与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相适应

关于战争本质的论述，自克劳塞维茨以来，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在这里的主要观点当然是遵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用列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点来批驳紧紧追随帝国主义政治的小毛奇、鲁登道夫和康拉德的错误观点：“克劳塞维茨……多次试图确定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点政治目的，但绝不是左右政治目的。这

①②③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8、82、184页。

位哲学家无意因此而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把战争变成最后的目的本身，而后来老毛奇及其追随者却是这样做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的性质决定于国内政治，而国家对外关系也取决于国内政治。政治是国家自身生产力增长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诚然，军事力量在战争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既然战争是一种政治行动，那么它就应当以政治数值，而不仅仅以军事数值作为基础。”^①

因此，外交家也好，总参谋部代表也好，对于所处的时代，各个不同国家在当前时代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政治的动力，以及各种政治力量追求的目的，都必须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就不仅只是遵循纯粹军事的考虑，而且主要的是遵循政治方面的考虑。说得更准确一些，那就是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只有采用这样的尺度，我们才有可能研究战争这样一类复杂现象。”^②“不能正确理解国家内部和国家对外路线上经济和政治的对比关系，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军事决策。我们时代的统帅部应当很好地掌握这一点。”^③这是因为，政治家们对待战争问题，比各国总参谋长要谨慎得多。在这一点上，总参谋部成员往往代表了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人，总是更加毫不掩饰地投身冒险行动，而政治活动家却比较审慎，他们虽然对军事学术的奥秘知之不多，但却更加知道战争的后果对一个国家将产生多么巨大的震动。^④

所以，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计划要与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相适应：“我们已经说过，为了在战争中达到政治目的而规定出军事目的，为了实现军事目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手段。谈到这些手段的范围时，克劳塞维茨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确定它的（指战争的——作者注）政治目的，包括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确定双方的国家力量及其各种内部关系；确定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以及它们的能力；最后，确定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联系和即将来临的战争对这些联系的影响’。”^⑤也就是说，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我们必须赋予政治原则以首要意义，并根据政治原则确定军事目的，而决不能只按照战

①②③④⑤ 沙波什尼科夫：《军队大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8、113、171、113、136—137页。